

浙東文化

EASTERN ZHEJIANG CULTURE



1999 1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

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总第十一期）

封面题签 启 功
封面设计 褚晓波
封底篆刻 钱 路



浙東文化

EASTERN ZHEJIANG CULTURE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半年刊)

主 编 董贻安

编辑 出版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

(地址: 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

邮编: 315010 电话: 0574-7349941)

印 刷 浙江省鄞县文教印刷一厂

浙内图准字(99)第106号

1999年6月出版

成本价: 6.00元

目 录

古籍与文献

- 《四明谈助》重刊序 毛翼虎(1) ✓
重刊《四明谈助》序 周时奋(3) ✓
张孝慈和约园藏书 骆兆平(7) ✓
重刊天一阁孤本纪闻 骆兆平(16)

谱牒学研究

- 《鄞蛟川周氏宗谱》考释 周时奋(26)

建筑文化研究

- 中国传统民居的环境观念 金济声(55)

河姆渡文化研究

- 河姆渡遗址的废弃和河姆渡文化消亡原因的研究 邵九华(65)
新石器时代漆器的考古发现与起源 熊巨龙 黄蔚金(77)

越窑青瓷研究

- 越窑装饰艺术之研究 林士民(86) ✓
试论唐宋元时期明州港的瓷器外销及地位 虞浩旭(102)
论越窑青瓷的装烧工艺 李 军(110) ✓

考古新发现

- 浙江宁波船场遗址考古发掘简报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20)
浙江宁波月湖历史文化景区考古发掘简报 林士民 褚晓波(131)

浙东佛教文化

- 古代明州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杨古城 曹厚德(134)
奉化佛教述略…………… 陈银根(145)

甬上史林

- 宁席起源年代试探…………… 周冠明(150)
谢安高卧之东山考…………… 诸焕灿(156)

博物馆研究

- 科学完美的设计思想 精美绝伦的艺术殿堂…………… 李俊杰(164)
中国的“天圆地方”——上海博物馆…………… 邢同和(169)
浅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的光照、色彩与陈列…………… 林 楷(173)

宁波传统家具

- 甬式家具的吉子和床围纹的解读…………… 吴 慧(179)

四明人物

从现代诗人到图书馆长

- 张汝训述略…………… 谢亚青(186)

文博简讯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现场馆开馆(2)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即“寻找文明”计划全面启动(15)宁波市文博学会与宁波日报副刊部举办全市十佳近现代优秀建筑评选(109)文物部门竭力保护月湖历史文化景区(168)宁波市业余文保员重新登记、发证(178)宁波海关文物部门联手查获文物走私案件(184)天一阁博物馆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协商古籍保护合作项目(192)
《浙东文化》(第1—10期)目录索引……………(193)
封面: 清华浚《花鸟》轴 (天一阁博物馆藏)

责任编辑、校对 徐建成

《四明谈助》重刊序

毛震虎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动员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已得到普遍的热烈的响应，不少有识之士深感整理地方文献，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爱乡爱国观念，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宁波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珍藏，如能加以合理开发和利用，必将有益于当前港城精神文明的建设。

清代道光八年（1828年），甬上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徐兆弔的《四明谈助》，就是一部非常名贵的乡土文献。徐氏素居甬东，而足迹遍涉宁属六邑——鄞、慈、镇、奉、象、定，兼游绍属余姚、上虞县境。举凡山川险夷、州县沿革、名胜古迹、神话传说、衙署第宅、寺庙宫观、水利交通、市舶外贸、人物事绩、艺文著述，无不成竹在胸，命笔于纸。特别是每于卷帙段落之间，坚持“以地为经，以史为纬”的优秀传统，力求纲举目张，条分缕析，以给读者获得深刻印象，丰满感受，恍有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之妙。是以徐兆弔先生呕心沥血，深思熟虑，费时十载，始克成书。《四明谈助》全书洋洋一百万言，足以补正以前地方史志某些缺失，亦可供后来修志者和写

作桑梓掌故者以丰富的参考资料。惜乎其书原来刻印极少，迄今仅存几部，只天一阁、伏跽室、市图、鄞图等有之，且多系复印本。本地及外来读者多不易借到，海外侨胞尤难寓目，且古装本繁体字无句读，一般读者阅读也有困难。

为此，平素较为留意地方文献的宁波文化研究会桂心仪、周冠明、宁波诗社何敏求、卢学恕四同志频来商讨，于是余遂偕徐季子、杨东标、成岳冲三同志正式向市政协提案，当经提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市政府交文化局研究办理。嗣后此事即承文化局局长周时奋同志积极研讨，大力支持，并交其文物处长董贻安同志负责筹组点校班子等事宜。董贻安同志不久便召开了一次有关的座谈会，除负责点校的桂、周、何、卢同志外，还邀请天一阁洪可尧、虞裕旭两同志列席。从此便逐步开展了标点、注解、校勘等工作。这部重刊的《四明谈助》，可使一般读者顺利阅读，从而增强爱乡爱国的热情。上述点校人员发挥余热，埋头苦干，精神可嘉。此书日后出版，可供学术研究应用，营造文化氛围，提高文化素质，功莫大焉。

(一九九七年冬序于天涯芳草庐)

文博简讯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现场馆开馆

(本刊讯) 6月26日，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二期工程现场馆正式对外开放。该工程自97年3月破土动工，总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重建了2800平方米发掘现场，主要展示河姆渡第四文化层的建筑遗址和第二文化层的水井遗迹；根据考古资料，复原建造了能展示河姆渡文化精髓之一，被誉为7000年前奇迹的5幢干栏式木构建筑。制作的40个玻璃钢河姆渡先民形象雕塑生动地再现古村庄先民生活、劳作的场景，体现出先民征服自然，繁衍生命的丰厚的文化内涵。整个现场馆整体布展效果良好，突出河姆渡遗址的文化直观形象，营造出远古河姆渡环境、生态及地形风貌的原始氛围，使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遗址馆。

(徐建成)

重刊《四明谈助》序

周时奋

(一)

宁波的乡邦文献，宋明以来，当称丰富，仅地志一门，实多鸿篇巨著。上可溯《宋元四明六志》，下至洋洋三百万言的光绪《鄞县志》、五百万言的民国《鄞县通志》，以至当代市、县地方志，也非百万言不尽其意。地方志以一地为记述对象，经经纬事，分门别类，或雕篇镂章，或耙古钩陈，努力遵循“志属信史”的原则，以求尽善尽美。然其体例所至，于常人阅读和使用均有心理和习惯上的隔阂，一是分类繁缛，索引困难，人事割裂；二是重史轻地，于人事所涉环境地点常虚无飘渺，有碍凭吊联想；三是因“官修”而重政治史、轻心灵史，于民俗风情、掌故佚事多删削在外。总之，缺少文学性和趣味性，于读者有一定心理距离这已是事实。这一事实常常表现为地方志需要有内行的中间人再解释，方可使人释然怡然。因此各地都有导游读物、掌故汇编、题咏集萃之类的书籍流行，以补地志不足。宁波清代有徐兆弔先生《四明谈助》一书，最重人文地理，于乡土掌故尤详，体例有别地志，在众乡邦文献中独成格局，颇受后人瞩目。故每有同仁提议再版，以饯后学。

(二)

徐兆弔字绮城，宁波城厢人，清嘉庆间贡生。关于他生平的史

料我们知之甚少,《鄞县志》谓“官诸暨训导。生平致力乡邦地理,尝仿高似孙《剡录》著《四明谈助》四十六卷,以地志随纪人物,经纬分明,辞义賾博,于郡县沿革、山溪险夷、旧迹原委、门阀盛衰皆可考见。”可见其一生的最大成就乃是《谈助》一书。此书起稿于嘉庆十八年(1814)前后,成稿于道光三年(1823),所谓十年成稿。曾一度在同好中相互传抄,苦于无资开雕。道光五年(1825),适逢选期,兆昌被委以诸暨学训,方得俸入刊行,于八年成书。这些简单的经过,均见诸该书旧版序跋。

关于著书的目的,徐兆昌在他的自序中有一段说明:“予生长四明,喜游四明山水,亦喜谈四明掌故。每与俦侣同游,于郡国分合、山溪夷险之未易详也,思从而汇之;于坊表门阀,善恶感召之未易悉也,思有以贯之。”这是他最原始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他想撰写一部有关家乡四明郡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能综而“汇之”、通而“贯之”的著述,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想从空间和时间的双重汇合中,为四明郡国建立起双重坐标的记录体系,而这一记录,又能够与他喜谈掌故的审世特点相吻合,与善恶感召的道德评判相辅衬。

于是他就必须摆脱历来地志体例的羁索而另辟蹊径。他是从同乡前辈学者高似孙的《剡录》得到的启发,其实《剡录》是一部更趋向散文化的地志,徐兆昌从中看到的却是在这部书背后活跃着的酈道元《水经注》的影子和精神。正如他说的:“一旦见高礼部疏寮所著《剡录》,以地志而随纪人物,纯仿酈道元《水经注》例,脉络井井,于是恍然曰:得我心矣。”其实徐兆昌创造了一种新的体例,他既吸收了游记的脉络框架,以勘舆龙脉为载体,又“以山为经,以人物事类为纬”,以清代宁波府属六邑即鄞、慈、镇、奉、象、定为主,旁及当时绍兴府的剡(嵊)县、上虞、余姚三县。所记“儒学、名臣、孝子、悌弟、山人、墨客、仙佛、鬼怪、衙署、祠庙、坊表、市井、宅里、

寺观、庵刹”均随地理而述录，并随文附有关咏景吟史的诗文。其书的作用，据徐兆禹自己所言，即是“其山川而有向背也，必纪之，以为谈地理者之一助；其人物而有报应也，必纪之，以为谈天道者之一助；其地理天道皆可疑，而辄涉于趣也，亦纪之，以为谈神仙鬼怪者之一助。”因而名其书曰“谈助”。谈助者，助谈也，然其书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助谈。

(三)

从《谈助》中可见徐兆禹十分博学，而他的治学态度也是严谨的。书中所记，十有六七都是有他亲察亲历，他曾在四明各地一一考察，以证之于亲睹；而另有十之三四，虽为耳闻，然亦一一查考求证，所谓“既以目治，又以耳治”。他的可贵在于他在严谨治学的前提下，又能以一种饶有趣味的审世态度和审美标准，广罗博采，雅俗等观，史笔与文笔交相运用，信史与传奇相妍见美。这种宽容的著作和学术态度，不囿门户之见，不以学科之限，因而更增大了著作的信息量，也使之具有了多重学科的研究价值。故其书也，举轻若重，举重若轻，瑰丽丰富，雅俗共赏。

需要说明的是，徐兆禹的记述线索，是以四明勘舆脉络为依据。这种现代人看来多少有些神秘的方法，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似乎更有些闪烁陆离。其实我们大可摒弃这种陌生的说法，遵循一种旅游的习惯，所谓在山沿脉、在水顺流，大体不会有错。比较困难的是，入城的“龙脉”原是沿城中水系而行，而旧城水系早已填没，因此在阅读之前，还是大体需要有一点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包括旧地名知识，这样才不致于“摸不着头脑”。

(四)

1997年冬的某一天，毛冀虎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向政协送一个提案，内容是希望重刊《四明谈助》。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说其好事主要有三，一是作为一种很好的乡土教材，可以让宁波的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了解自己的出身之地；二是发掘城市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三是《四明谈助》自道光八年刊行后，一直未有重刊，170余年来世事沧桑，今传世本当属寥寥。虽于八十年代末市文物保护因工作需要，用扫描的方法翻印过五十部，杯水车薪，对外影响不大。毛老说：“这件事我仅只起个头，军事已高，不可能实际操办。我要托你几件事，一是我只向政府提出八万元补助，估计经费差距较大，余下的请文化局保底，二是你要负责组织一个班子，来具体做好标点、勘校、注释及有关出版等事宜。三是你要当作一件事来做，自己要关心指导。”我深为老先生的精神所感动，遂一一应允。

此次编校工作得到钱、毛、徐、李、周五位顾问的悉心关怀，上述均是当代宁波学界的领袖人物。组织工作由文化局文物处董贻安处长负责。毛老亲定桂心仪、周冠明、卢学恕、何敏求四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四先生均为宁波地方文化和古典文献方面的饱学之士，受此重托，欣然从命，不计年事，不计寒暑，克勤克勉，精神尤可褒奖；冠明先生一肩统稿之重任，精益求精，躬行始终，堪称劳苦功高。重刊《四明谈助》实系众手戮力之为，成书之日，深觉于前人、于来者，都是一笔厚重的文化交待。人生能得此盛举，虽苦犹甘。

(1999年3月29日)

张寿镛和约园藏书

骆兆平

张寿镛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和藏书家。他的约园藏书对其读书、讲学和编辑出版乡邦文献都曾起过重要作用。

(一)

张寿镛字咏霓，号伯颂，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生于清光绪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九年中试癸卯恩科顺天乡试第三十三名举人，次年会试报罢，十二月以知府衔到苏委充点名发饷。光绪三十一年充江苏仕学馆提调，此后会办江苏海运四年。宣统年间，充江苏藩司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度支公所淞沪总稽查，调甬榷科科长兼典用科科长。民国初年任上海货物税所所长，后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财政厅长。十四年任沪海道尹。十五年十一月管理财政部总务厅，十六年九月任财政部次长，主张藏富于民^①，二十年十一月辞职，他说：“一朝卸职，如释重负^②。”

去官后，张寿镛就集中精力去办好光华大学和编刊《四明丛书》，以了却这两件多年的心愿。他说：“自丁未以后，尽辞职守，于时专心一力，今人与居者在光华大学，古人与稽者在四明丛书^③。”

光华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张寿镛就职沪海道尹的

第三天,便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美国教会在上海所办的圣约翰大学当局压制学生爱国行动。六月三日,该校学生五百五十三人愤而离校,华籍教职员十九人亦因而辞职。离校师生员工和学生家长共谋自立学校,名光华大学,余维张寿镛为校长,先临时租赁了校舍。社会名流王省三(丰镐)捐沪西大西侧之地六十余亩,以为校基,张寿镛筹款以筑校舍,逾年而成。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时,光华校舍遭受破坏,一度迁到愚园路上课。这时,张寿镛已辞去官职,专注于光华的发展,经过数年努力,增购约六十亩校地,陆续兴建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工场、疗养院、大礼堂等设施。光华师生将礼堂命名为“丰寿堂”,表示对王丰镐和张寿镛的敬仰。

抗战开始,光华大学受到沉重打击,“二十六年七月,日人再入犯,八月兵锋及上海,光华再迁於愚园路,又转徙入租界……十一月十二、三日,敌入上海西郊,光华校舍悉为所毁,千间广厦,存者三、四间而已。”^①张寿镛痛心之余,仍不气馁,次年在成都筹设光华分校。他转道香港、重庆,至成都主持开学典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失去掩护作用,光华只得停办。张寿镛改设诚正学社、格致学社、和壬午补习班,以容纳原文学、理商和附中学生。他本人又在自宅藉“养正学社”为名,为学生讲课。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在家病逝,去世前,还殷殷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为念。

张寿镛编刊《四明丛书》发端于一九三〇年,意在征集和保存宁波一郡文献。宁波自宋以来,渐渐成为浙东学术重地,理学大师接踵而兴,元、明、清时期,哲儒辈起,遗著不下数千百种,然而佚者过半,未刊者甚多,虽刊而稀见传本者又复不少。因此,合刊乡贤著作而为丛书,便是一项抢救性保存地方文献,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推动学术文化发展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

张寿镛自民国初年即开始搜集四明文献，此后又对乡贤遗著作了广泛调查。他依据各时期郡县艺文志等资料，编成《四明经籍志》五卷。又计划就各藏书家所有，而《四库全书》未录之书，考其版本，仿四库提要之体例，编写四明经籍提要。于是联合同志十余人，集资数千元，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三楼藏书室作为社址，礼聘同乡耆宿夏启瑞为编辑主任，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起着手编辑。原打算三年成书，后因故只汇集四库提要部分，编成《四明经籍提要》甲集十卷。张寿镛把这两部书目列入《四明丛书》第九、十集中出版而未果。

《四明丛书》分集出版，第一集于一九三二年刻印告成，受到学术界的欢迎。论者以为“同光之间海内刊刻地方先哲丛书者蔚为风气，在吾浙如湖州丛书、金华丛书及武林往哲遗著等为尤著，而宁波受海通之影响，俗习变迁，才智之士骛功业而忽故闻，独未有闻风兴起者^①。”《四明丛书》的出版“能尽阐扬先哲清芬之责，而益足光大浙江人文献之光荣矣^②。”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明丛书》已刻成四集，共收书一百种。在五、六年时间里完成百种古籍的校刊工作，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之快的。此时，张寿镛已六十周岁，他说：“我积二十年功夫，搜到乡邦文献不下四百余种，就我已刊之四集约百种，然已化费至二万金，再刻六集，非再有三万金不可，现在经济上已形拮据。”^③然而以后几集又不能不刻，尤其是《宋元学案补遗》一书，由清王梓材、冯云濠辑补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之未备，全书一百册，内容详尽，所采录之书在民国时已经罕见，又因卷帙繁重，故列为第五集单集出版。

整理《宋元学案补遗》前后历时五年。“原稿纸薄如蝉翼，字细如牛毛，而分条剪裁，往往阔不盈寸，当粘合处又欠牢固，一经翻手，翩然飞堕，若再十年无人收拾，将充蠹鱼食料矣。”^④终于在夏

同窗等朋友的帮助下“校刊完竣，为生平第一大快事。”^⑥

当第五集校刻之时，抗日战争爆发，张寿镛在该集序文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献文，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於万一”。此后第六集、第七集也是在狼烟烽火中校刊而成。一九四〇年暮冬，张寿镛撰写了一篇《编辑四明丛书记》，对前一段工作作了小结，他说：“自第一集至第七集，凡一百六十种，都一千七十七卷（笔者按：据集前目录，实为一千八十一卷）。清四库著录者约十之三，未著录而得诸冯君孟颀伏腊室者约十之二，其乞诸友朋者与夫子孙献其先世遗述者约十之一，寿镛积四十年之搜索而得者十之四焉。”第八集刊未及半，他便去世了；后于一九四八年由其子星联等刻印完成，共十八种，九十六卷。冯贞群（孟颀）遵其体例补写了第八集总序和后序。第九集第十集只存拟目，见《约园杂著三编》。

张寿镛虽身处忧危，而著述不废，当时已刊印的有：《约园杂著》八卷（1935年），《约园杂著续编》八卷（1941年），《约园杂著三编》八卷（1945年），《游蜀草》三卷（1939年），《约园讲演集》一卷（1941年），《诗史初稿》十六卷（1942年），《史学大纲》一卷（1943年），《诸子大纲》一卷（1944年）。

（二）

张寿镛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张嘉祿，光绪三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补兵科给事中。他对张寿镛立身为学，居官理事，都有深远影响。

张寿镛自幼颖悟，喜读书，能全部背诵《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十三岁那年，族叔出题命对，题曰：“才了蚕桑事”，他马上对

答：“先知稼穡艰”，闻者甚为赞赏。及年长，读书愈多，且注重学以致用，曾说：“读而不知用，读如不读。”^⑩他至老仍手不释卷，说：“我到六十岁无敢抛弃书本，近年除光华以外，一意勤书……我自觉学问种种欠缺，老而秉烛，不敢不勉。”^⑪

张寿镛自称是“读书人而号藏书家者。”^⑫有述怀诗云：“藏书如不读，滋味那知长，琳琅廿万卷，乘刻不寻常。取之自怡悦，聊作饭食粮。编目犹非易，尽读岂能央。”^⑬又说：“藏书而不能读，读而不能用，何必藏书。”^⑭这就是他的藏书观。

张寿镛年轻时即开始收藏典籍。自以为：“由鄂调燕此数年最无足述，然收罗书籍之多，实在数年中，随得随读，以补历年佳途中未读之失。”^⑮一九二五年以后久居上海，所获益精。一九二九年收陶氏涉园书。一九三〇年收鄞县宋氏一覽楼书，阮元校《太平御覽》及元天历本《范文正公集》就得自一覽楼。《太平御覽》原有一千卷，但据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记载，约园所得为阮元集幕友何元锡等校宋本，存三百六十六卷。

抗日战争期间，大江南北文物遭殃，张寿镛受政府委托，与郑振铎、徐森玉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两年中共收购古籍善本四千八百六十部，普通本一万一千余部，使这些祖国文化瑰宝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破坏，或流失海外。这批古籍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后来郑振铎回忆说：“咏霓先生的好事和好书之心也不下于我。我们往往是高高兴兴地披阅着奇书异本，不时的一同拍案惊喜起来。在整整的两年的合作里，我们水乳交融，从来没有一句违言，甚至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咏霓先生不及看“升平”而长逝，我因为环境关系，竟不能抚棺一恸，抱憾终生，不忍见我们所得的书，谨以此“目录”奉献给咏霓先生，以为永念。”^⑯

同时，张寿镛为了校刊《四明丛书》，亦不断地补充约园藏书，先后向北平图书馆、嘉业堂、文澜阁等公私藏书家抄所未备。“积

五十载之时光，储十六万之卷轴，以私人之力而欲与秘阁抗衡，可谓痴矣！”^①其藏书印有“寿镛”白文方印，“永宽”朱文方印，“约园藏书”白文方印等。

约园藏书目录，初期多为友人或学生所编。“第一次则书贾老丁为之，时在北平西安门内，谓之丁目，专载善本。第二次则由平至杭，由杭至沪，友人刘庆澄为之，谓之刘目，时在上海慕尔鸣路。第三次则移居觉园，先为之者其族弟寿荪也，谓之张目。次为之者其门人陈生楚善也，谓之陈目。再次为之者费生和笙也，谓之费目。凡开账式之目录，今存者五种。”^②张寿镛亲自编订的书目有《善本书志》二册、《元明刻本编年书目》二册，晚年整理藏书，撰有癸未检书记和甲申检书记。“藏书全目，合善本普通本编之，经部集部较有眉目，而集部尤完，史子则略树基础而已。最后命其孙肇先写分藏书目，然后由分藏而编为分类书目，更由分类书目而分编善本书目、普通书目，由其五子芝璠为之，尚未能藏事也。”^③

现存流传最广的书目，是收入《约园杂著三编》中的《元明刻本编年书目》二卷。此目以刊本刻岁为次，是一部版本书目，著录元刻本及元刻明修本五种，明刻本七百零七种。明刻本中有嘉靖刻本二百十八种，万历刻本二百五十种，占半数以上。

约园藏书多有题识，通过题跋以考证书之渊源、版本及价值。今天一阁新入藏书籍中有一册《约园藏书题识目》，朱丝栏抄本，共著录四百九十八种，惜有目无文。《约园杂著三编》卷一至三，收录约园题跋二百六十篇，其中批校本四十二篇，明抄及精抄本一百一十二篇，普通抄本一百零六篇。他说：“余既幸而得此，若不为之阐扬幽渺，苟一零落，后人安知更有此书存者乎。”^④

约园藏书旧址在上海北京西路常德路，关于约园的命名，张寿镛在《约园杂著续编自序》中说：“追溯生平，一溺於词章，再溺於简牍，三溺於诗多斗靡，於是思幡然易辙，自号约园。”又说：“余何尝